民企“跑路潮”对温州社会信任的影响及重构研究^{*1}

易晓文

自2008年以来，温州许多企业主不堪重负，为躲避债务而纷纷“跑路”。“跑路潮”的蔓延，不仅给温州经济带来巨大创伤，对民营企业发展和转型升级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温州社会信任也造成了不小冲击。温州社会信任的破坏，表现在各类机构之间的互不信任，政府不信任银行，银行不信任企业，企业也不信任政府。社会信任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信任一旦被破坏，想要重构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好的。除了政府方面需进一步努力之外，还需金融机构、企业、社会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跑路潮”；民间借贷；社会信任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7）02—0240—06

一、前言

温州曾在各种政策引导下形成了外向型经济，大量民营企业活跃在国外市场。但是，近年来，外部需求的降低对温州整体经济造成了不良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家货币政策从紧，一方面使得温州民营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融资成本不断上升，从而企业资金受限，出现了资金链断裂^[1]；另一方面，银根紧缩迫使很多民营企业高息借贷，而这种高息融资又进一步加剧了民营企业的成本负担。^[2]再加上温州民营企业自身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经营管理不善、企业投资决策失误、企业竞争力缺乏^[3]等等，种种原因叠加，最终形成了这场影响巨大的“跑路潮”。“跑路潮”的蔓延，不仅给温州经济带来莫大创伤，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转型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对温州社会信任也造成了不小冲击。

信任是指个体之间基于行为期望^{[4][5]}、安全考量^[6]等而产生的一种心态。社会信任则是指众多个体交往中各种心态相互影响、彼此作用、共生共融的群体性意识网络，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特质。^[7]社会信任随文化道德、社会制度、经济发展、个体经历、信息情况等因素的变化而发展。由于社会信任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因此，在不同信仰的国家或地区，因受文化道德的影响不同，产生了程度及模式各异的社会信任。^[7]社会制度的差异也导致了模式各异的社会信任^[8]，且相同的社会制度在不同的地区或国家以及不同时期也能产生形态不同的社会信任模式。^[9]当然，社会信任不仅与社会制度有关，也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10]经济行为者常常通过镶嵌于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彼此信任来防范欺诈与不实行为的发生^[11]，健全的产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坑蒙拐骗的盛行，从而奠定了企业信誉与社会信任的基础。^[12]个体以往的经历——特别是在幼儿时期的经历，是决定个体信任感的关键因素，幸福经历更易产生高信任感，而不幸遭遇则往往容易导致对周遭的怀疑。^[13]社会交往中个体的人品、动机、能力、预期得失等信息情况是决定彼此信任程度的关键因素，特别是持续交往中的重复博弈^[14]，更是强化了社会信任感好坏的程度，朋友、熟人关系便是典型的例证。

显然，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阐明了影响社会信任的基本因素及作用机理，在一定程度上为论述温州民营企业老板“跑路潮”

1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温州民间借贷利率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机制研究”（13JDWZ02YB）、温州市/温州大学金融研究院招标研究项目“温州民间金融规模的估计与预测”（13JDWZ02YB）

易晓文，温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系主任，温州市/温州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温州人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浙江温州 325035）

对温州社会信任的影响及其重构提供了理论前提。故此，有必要以民间借贷风波为切入点，立足于温州民营企业老板“跑路”的现状及引发这场“跑路潮”的一系列原因，尤其是在当前金融改革的背景下透视其造成的影响，为温州“跑路潮”之后民营企业的发展及重建温州社会信任提供参考。

二、老板“跑路潮”对温州社会信任的影响

实际上，温州的“跑路潮”在2011年年初就已初露端倪，当年4月开始更盛，多达90余家的民营企业老板因欠债跑路，相关的信贷规模经估计达200亿元。这场声势浩大的“跑路潮”不仅是经济领域的一场动荡，对温州经济的发展以及民营企业的成长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是社会领域的一场危机。频频传出的“跑路”消息使温州一度身处舆论的漩涡，很多温商都意识到，温州的债务危机，已经不仅仅是纯粹的债务危机，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一）机构层面的信任危机

从温州民营企业“跑路潮”的原因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来自经济环境、宏观经济政策、民营企业自身等多方面的原因最终造就了这场盛况空前的“跑路潮”。在这众多的原因之中，我们可以窥见“跑路潮”对温州社会信任所造成的不同方面的影响。温州社会信任的破坏，首先便表现在各类机构之间的互不信任，政府不信任银行，银行不信任企业，企业也不信任政府，三者之间出现了巨大的信任危机。

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任危机。这场浩浩荡荡的“跑路”风波首先危及的就是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民营企业对于浙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撑，而它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依靠商人自身所具有的诚信品格以及良好的银企关系。但是，“跑路潮”的到来重创了银行与民营企业之间的美好关系，使其一步步进入紧张时期。温州的各银行对民营企业既忧心忡忡，又顾虑重重。银行面对那些欠债不还，又将资产转移，任由企业自生自灭的企业主无能为力，却也只能用银行的利润来填补这些不良贷款。

当然，银企关系的紧张不仅是由于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不信任，还包括民营企业对银行的某些做法感到心寒而信任骤减。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家曾出台4万亿元的救市政策，使得各级银行面临大量的放贷任务。于是，为了完成任务，银行便追着企业进行贷款，即使企业没有担保能力，银行也会想尽办法来帮助企业撮合互保，这样一来，银行可以完成任务，资质差的企业能够获得贷款，资质好的企业也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可以说是一举三得。但是，这种做法却埋下了隐患，一旦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银根紧缩，银行就会开始不断抽贷、限贷、压贷，这对那些投资周期长的企业来说是一场灾难。企业家指责银行的“诱贷”行为把他们逼上绝路，而银行对此的回应则认为企业自身出了问题而不得收回贷款。

2. 地方政府与银行之间的信任危机。“跑路潮”的出现，不仅给温州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同时也威胁着社会稳定，对温州社会未来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通过统计数据表明，2014年以来，温州市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明显增加，上半年全市法院共受理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780件，涉案标的额近亿元；受理二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57件，涉案标的额1822.8万元。^②多种案件的频发，使得温州社会越来越不安定，阻碍其进一步的发展。

3. 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任危机。地方政府虽有意帮助民营企业渡过难关，出台了各类政策争取金融机构的支持，对银行提出了相关的要求，这也算是当地政府对身体处困境的企业伸出的援手。但是，在大量民营企业老板跑路的背景之下，社会信任崩溃，银行不信任企业和地方政府，不执行政府的要求，很多政策和措施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使得地方政府想要帮助企业

² ①数据来源：http://www.whnews.cn/news/node/2014-08/14/content_6145486.htm.

的想法破灭。由此，那些已经跑路或者正在跑路的企业也就无法看到政府对其支持的行动，地方政府的承诺无法兑现最终导致了企业对当地政府也失去了信任。

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三者之间的这种不信任，不仅是银行与企业、地方政府与银行、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还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也面临威胁，各种担保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也大不如前，使得地方政府政策无法有力得到实施。企业得不到支持和帮助，最终会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会给社会信任带来极大的破坏。

（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

“跑路潮”之下，不仅是机构之间的信任遭到严重的破坏，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未能幸免。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了信任，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会产生很大伤害。

在“跑路潮”的背景下，温州民间金融问题在困局中求索，民间信用体系面临坍塌。有很多专家认为，温州民间融资体系的问题，不仅是简单的金融体制的问题，更是温州实体经济的问题。由于许多民营企业的老板都因追逐利益而将大量资金投入各类的投机活动，实业经济发展其实是空有其表，实体经济不断走向产业的空心化，各类产业转型升级进程非常缓慢，不少民营企业都成了民间借贷链条的融资平台。民间借贷资金对于温州发展实体经济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温州市场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其中小微企业就占据了80%，而诸如银行等正规的金融机构不会轻易贷款给这些小微企业，它们只能依仗“草根金融”的支持。然而，“草根金融”的短板在近几年日益显现，使得民间信用体系逐渐崩溃。

温州民营企业老板的“跑路潮”，使得原本搭建在企业老板与老板之间、朋友与朋友之间、亲戚与亲戚之间的信任平台就此坍塌，过去靠信用维系的民间借贷也不再可能。现实社会中，人情、关系、面子显得尤为重要，而在社会信任不再如往常之时，所谓的人情、关系也就没有曾经那么有用了。那些携带巨额资金“跑路”的民营企业老板利用他人的信任换取金钱，殊不知他们跑掉的是社会最重要的信任。中国社会是一个用亲情维系的圈子，在这个圈子里，人们之间的亲情信任与共同利益相互支撑，彼此相依，当跑路之势越发盛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随之倒下。

三、“跑路潮”后温州社会信任的重构

社会信任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信任一旦被破坏，想要重构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好的。温州市政府在重构社会信任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虽未取得良好成效，但仍应继续坚持，在改革中本着为温州民营企业发展服务的精神，攻坚克难，敢于创新，为温州经济的发展不断努力，从而为社会信任的重构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当然，除了政府方面需进一步努力之外，还需金融机构、企业、社会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一）加强政府信任建设，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一个有效的政府对于形成一个规范有序和普遍信任的社会至关重要。^[15] 在整个社会各方面信任中，政府信任应该说是一种最高层次的信任，所以，在重构社会信任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作为社会规则制定者和监督管理者，政府应该承担起这份责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自身的行为引导整个社会的行为，起到示范效应。同时，必须完善社会信任体系，建立有助于重构社会信任的各项制度，努力克服社会信任危机。奖励守信者的同时严惩失信者，在制度上提高违规者的机会成本，不断引导人们形成相互之间的信任，并且通过各项制度协调社会群体中各方面的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得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能够形成互信的机制。此外，政府更应该履行好监督职能，对各类社会活动进行有效监督，并且完善公共监督机制，强化政府、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等不同领域的相互监督，通过彼此的制约来提高整个社会的信任度。

当然，政府在发挥自身作用时，也要把握好度。政府的监管固然重要，但过度的监管就会带来负面效果。因此，政府应避

免过度地干预，需放宽对行业、价格的管制，促使资金能够更加高效、自由地流动。只有政府不断规范自身行为并且引导市场规范运作，才能让整个社会在其治理下更加规范，从而在社会信任的重构中发挥表率作用。

（二）创新金融改革，持续推进增信机制

自从温州金融改革综合实验区的总体方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通过以来，温州的金改不断推进，许多专家、媒体都非常关注并为此出谋划策，希望将温州金融做大做强。但是，这个对温州来说难得的机遇却并没有呈现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在金改中不断出现一些偏离改革主题的做法，使得改革的成效大打折扣。国务院对于温州金融改革只是出台了“十二条”内容，给了原则性的指导方案，但没有过多具体的说明。也就是说，温州金融改革的主动权在温州。然而，这个原本应该是温州金改成功的关键因素，却成为阻碍建设温州金融改革实验区的绊脚石。在改革的取向上，往往存在比较强烈的风险厌恶偏好，因此在具体方案实施中就表现为将所谓的“风险”尽量管理起来。最终，温州地方的金融机构不断设立，相关部门的权力不断扩大，严重影响了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效果。

因此，温州的金融改革应该进一步创新。既然作为试点，就不应该畏首畏尾，而要发挥温州民间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意识，尊重群体，尊重市场，尊重客观规律。改革并不是不断地强化管制，而是要学会为民间金融放权，通过激发温州民间金融的活力和想象力，创新温州金改，建立中小金融机构服务体系，促进温州民间金融走向合法化，为中国的金融改革提供经验。此外，温州市政府应持续推进增信机制，设立信保资金，帮助小微企业增信；推动小微企业保险保证机制试点，弥补社会担保机构的缺失。

（三）促进金融体系阳光化，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

近年来，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已逐步威胁着金融系统的稳定。“影子银行”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以及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销售的信贷类产品，二是以民间高利贷为代表的民间金融体系。“影子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有国有垄断银行的一个补充，这种补充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是一种有利条件。但是，这只限于当企业现金流状况良好时的情况，而当企业资金链断裂，那么这个体系固有的抗风险能力弱的缺陷便会带来严重后果。

因此，必须制定相关政策，通过各种行政性管理手段对“影子银行”进行控制。更为重要的是，要切实推进利率市场化和金融所有制的多元化。利率市场化能够大大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而金融所有制多元化则必须考虑让更多的民营和私人资本进入金融运营领域，不断促进社会整体利率体系和“影子银行”体系阳光化，最终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

（四）完善法律制度，加强民间借贷监管

法律制度能够为社会信任关系的重构保驾护航。在法治时代，依法治国理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法律对道德规范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有着重要作用。法律所规定的基本责任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可以说是人们社会行为的一条底线。因此，重塑社会信任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健全社会信用制度，以法律权威来规范社会主体行为。此外，可以通过契约方式，对风险进行限定以减少信任关系的不确定性，使信任在任何个人、组织之间成为可能。各项法律制度的完善能够为社会信任提供制度保障，对社会信任的普遍增强也有一定作用。

另外，通过各项法律制度的制定，在制度层面规范民间借贷行为。近年来，我国民间借贷虽然在不断发展，但是并没有步入规范化道路。如果在监管上缺位，那么国家对风险的控制就会集中在高利贷事件发生之后的处理和打击非法集资上面，而没有对事前、事中、事后进行某种制度性的管理，这往往会降低应有的效果。所以，相应的制度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也应该受到重视。

（五）强化社会公德建设，重塑良好社会信任风气

社会信任的重构不仅需要政府的参与和法律的保障，更加需要在整个社会中形成良好的信任意识。只有社会成员发自内心的信任，才能进一步重建整个社会的信任。因此，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全社会宣传社会信任的重要性，引导社会心态，加强整个社会信任意识，重塑良好社会信任风气。只有当人们的信用意识都不断增强，能够自觉地维护信任体系，当守信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时，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才能够更好地实行，重构社会信任的目标才能够早日实现。

（六）温州民营企业自身努力，重建银企关系信任

在这个经济转型发展时代，温州民营企业应该要正视自身的弱点，顺应时代的潮流，努力解决自身的短板。温州民营企业由于自身原因，不能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足够的信任，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严重伤害。因此，民营企业需要加快自身的转型升级，对产业结构进行进一步调整，进军新兴产业，运用新的科学技术，迈向高端产品的发展，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只有自身实力不断增强，才能让银行转变对民营企业的看法和态度，重建银企之间的信任关系，促进自身以及温州经济的发展，同时对社会信任体系的重构也有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 [1] 何锡金. “温州跑路现象”的原因和启示 [J]. 经济纵横, 2012, (3).
- [2] 朱迎尔. 谈民间高利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对各地民营企业不同影响的原因——以温州和宁波为例 [J]. 商场现代化, 2013, (3).
- [3] 马山水, 胡加佳. 温州民营企业老板“跑路”的深层原因与效应 [J]. 宁波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2013, (5).
- [4] Baber.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Trust.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3.
- [5] M. Deutsch. Trust and Societ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58.
- [6] Niklas Luhmann. Trust and Power. Chichester New York, 1979.
- [7] (美) 福山. 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M]. 李宛容, 译.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1998.
- [8] S Hix, B H 魁 yl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Union, 2005, Vol. 7.
- [9] Dasgupta, Partha, John Wiley & Sons. (eds.).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In Diego Gambetta, Oxford: Basic Blackwell, 1988.
- [10] Kreps, David M, James Alt and Kenneth Shepsle (eds.). 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1] Schotter J B. A New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67, Vol. 4.

[12] 张维迎. 产权、政府与信誉 [M]. 上海: 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1.

[13] J. B. Rotter. A New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67, Vol. 34.

[14] (美) 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下) [M]. 邓方,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15] 李萍, 赵明亮. 从现实人格失范维度看信任危机 [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10).